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本期專題〉：新世紀的東亞位置

T. J. Pempel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徐 郁 芬 3

高增杰

《日本的社會思潮與國民情緒》

莊 文 一 7

Mark Bees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Dynamics, National

楊 昊 12

〈長篇書評〉

Karl Deutsch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Emanuel Adler &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許 文 妍 16

〈一般書評〉

James Cliffor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王 宏 仁 27

Robert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毛 維 准 30

政 治 科 學 季 評

二
〇
〇
五
年
十
二
月
第
八
期



資深編輯顧問

蘇彩足、石之瑜、江瑞祥

編輯顧問

王順文、莊國銘、廖高賢

主 編

吳昶展

編輯委員

潘惠伶、莊文一、李靜旻、蕭育和、蘇軍瑋

黃國鈞、柯斯安、曹維倫

校外編輯委員

江妍儀、廖斌洲

發行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 2391-8756

T. J. Pempel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徐郁芬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所國際關係組碩士生

一、介紹

東亞地區的區域主義發展近年來備受關注，不論在演進邏輯或是實際運作模式上都別具特色，因此學者將早期 1950、1960 年代在歐洲發展的區域主義稱之為第一波區域主義；而稱東亞現下正在發展中的區域主義為第二波區域主義，亦稱為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通常新區域主義的研究多以 1980 年代末期為起點，以 1989 年成立的亞太經濟合作會(APEC)最具代表性，APEC 囊括了許多新的特色，包括：「開放式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即與非會員國分享自由化的利益、以自願主義為準則、共識建立的決策程序、非拘束性的規範等。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區域合作的發展更繁複，故致力研究第二波區域主義走向的書籍亦逐年增加。部分相關書籍的切入角度主要是從區域內政府間正式的合作機制發展進而分析新一波區域主義之演變，然而 T. J. Pempel 主編的《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一書特別之處在於並非僅將重點置於東亞地區政府間制度組織，而是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重新詮釋東亞地區區域主義的本質及發展。書中主要有兩大重點：第一，點出政府間制度並非推動東亞區域整合唯一的推手，例如像跨國公司這類非正式的合作網路也成為促進東亞區域整合的另一股動力，故研究的對象不僅僅限縮在「國家政府」的角色上，非政府角色亦為重要研究對象。第二，Pempel 在本書章節安排中規劃完整，從不同層次以及不同議題範圍檢視東亞內正在建構



書名：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編者：T. J. Pempel

出版者：Cornell University

出版地：Ithaca

出版日期：2005 年

頁數：315 頁

ISBN：0801489091

中的各種複雜之合作型態，例如東協加三、跨國公司網絡等等，最後總整理出東亞區域整合的內涵與邊界是不斷地「重新構圖」(remapping)中¹。

欲瞭解新區域主義的發展，必須先對早期區域主義有概括的認識。回顧第一波區域主義對區域整合的研究多半著重在以歐洲經驗為中心的整合型態與邏輯，主要藉由「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實質建構作為評判整合程度高低之指標。反觀東亞²地區，可以發現若以歐洲整合之制度化標準檢視亞洲區域整合的程度，只能得到「低度整合」的結論。然而，由於全球化浪潮的影響，東亞國家之間實際的經濟互賴與合作關係日趨緊密，歐洲中心的區域主義實不能深入瞭解亞洲區域發展的特殊型態。鑑於此，《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一書中，首先點出由於亞洲地區之特殊環境背景因素，提醒吾人必須從不同於歐洲中心的區域研究角度，觀察東亞地區逐漸發展且愈趨綿密的特殊互賴網絡；其次，更進一步指出東亞擴張中的跨國網絡和深化中的區域連結為此區域特別的整合建構模式，並且在此之

¹ Pempel認為區域為流動且複雜的生理、心理的複合體，且區域主義的行為特徵是持續地被重新創造和定義。Pempel在本書中強調的「重新構圖」(remapping)的概念，指的並不是劃分主權國家之領土界線的消蝕，而是指複雜的合作界線正在東亞內建構，並且重塑我們對東亞的認知。

² 由於近年來APEC體制面臨合作繼續推展的障礙，倒是以東協為中心出現的東協加一、東協加三機制有新的斬獲，故近來研究亞洲區域整合中，所強調的「範圍」，已逐漸從「亞太」轉移至「東亞」。然而實際上範圍的區分，還是依各個不同研究者與研究主題而有所不同。

中，主要由三大類驅使者(driver)：政府(governments)、公司(corporations)、問題導向的聯盟(ad hoc problem-oriented bodies)主導區域內合作開展，並且透過兩大途徑：由上而下(top-down)、由下而上(bottom-up)同時編織合作網絡(spin webs)。書中對兩大途徑的解釋，一則為強調區域主義(regionalism)之由上而下、透過政府間制度的合作過程，例如：ASEAN、APEC、ARF等；而另一則指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是由非政府角色的跨國合作所帶來的由下而上的合作建構過程，例如：公司、NGOs、以及第二軌團體等。

本書總共有十一章，分為三大部分鋪陳東亞區域主義目前發展的圖像。第一部分藉由比較研究觀點檢視東亞區域主義，Etel Solingen系統性地整理出東亞區域機制的特徵與特殊性，在對照歐洲經驗下，觀察到東亞區域機制的「非正式性」(informality)是東亞區域主義的特色之一，且東亞機制是鑲嵌(embedded)在近年來高度與全球政治經濟整合的區域性經濟、政治和社會脈絡中，機制間存在著既合作又競爭的事實。Geoffrey McNicoll則是從人口統計學的角度切入，觀察東亞社會的人口發展特徵，以及其與東亞區域整合之關連性。

第二部分主要探討區域整合的驅動力為何，分別從國家與公司兩個層面分析，也是呼應前述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兩大分析途徑。在國家層次方面，Andrew MacIntyre and Barry Naughton 以東亞區域經濟以及東亞國

家政經結構作為兩個分析變數，闡述由日本主導的雁型理論發展下的區域經濟以及 APEC 模式的區域合作如何興起以及衰退。Keiichi Tsunekawa 則深入分析現下東亞地區數個不同整合藍圖(map)出現的成因為何，以及為何區域機制在各類不同議題上的合作型態存在顯著差異，他進一步分析軍事安全、毒品控制、貿易暨投資自由化、金融貨幣合作、以及環境保護等議題領域中的合作模式之差異，最後發現，由於東亞地區內各國在各面向的分歧性過大，因此並未發展出像歐盟一樣具制度化的合作過程，而是仰賴實質的、議題取向的個別區域合作機制，來因應全球化對區域內國家造成的衝擊與挑戰。在公司(非國家)層次方面，Dennis Tachiki 研究外資(FDI)在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且解析跨國公司的區域佈局與策略又是如何由下而上地深化區域合作網絡。Hatasha Hamilton-Hart 亦關注個別國家內，存在之跨國企業網絡如何促使區域合作更加綿密。

本書的第三部分更深入地探討區域連結中，制度、利益以及認同與區域主義之間的關係為何，Laura B. Campbell 與 David Leheny 分別從環境、安全(恐怖主義)的議題，廣泛討論並細究特定議題中，區域制度、利益以及認同之間的關係，以及歸納出某議題中，區域主義所呈現的特殊面貌。兩相比較下，可以發現各議題中關注的焦點以及其中區域主義的發展程度、方向，均各有特色。另外，Paul Evans 指出不論是政府或是非政

府層次中東亞區域的合作組織存在多元重疊(multiple overlapping)的複雜現象，提升東亞區域主義研究的困難度，未來的走向仍無法預測。Pempel 於最後一章中作結，指出本書的許多章節中都顯示出不同的政府，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公司、NGOs 和公民團體，對區域連結有不同的認知和偏好，使得區域主義的內涵因著不同的議題、制度和倡議而異。除此之外，私人企業比政府更活躍於區域化的推動，區域內由下而上建構的生產、貿易和跨界服務網絡成為推動區域整合實質且重要的驅動力。

二、評論

在章節安排方面，《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一書的結構分明、敘述清晰，尤其是將全書分為三大部分，內容由淺入深、條理清楚：首先，從比較觀點中拉出東亞地區的獨特性；其次，進一步深入國家、公司兩個層次，探討實際推動區域整合的因素與形式；最後，就不同的議題範圍，探究政府間制度、政策網絡內涉及的利益、以及區域合作中的認同因素，如何互動並形塑區域整合的內涵。本書雖為合輯性質，然分析邏輯的前後一貫性良好，使讀者不會迷失在單一個案的細節探討中。

在推論邏輯方面，全書在論述中均緊扣主題，不斷強化書中欲傳達的主要訊息：雖然存在著區域整合的壓倒性結構障礙，近來東亞已變得較互賴、連結、凝聚，並且這些連結的網絡已透過跨國合作、協調、互賴的網

絡、甚至是正式制度整合的密集發展，變得更深、更多、更廣泛。是故，此區域中，正在浮現的連結顯示的不是競爭，而是合作 (ripe for cooperation)。因此使讀者對此區域發展的大方向以及實際合作狀況都能有明確的概念與掌握。

然而，本書在理論內涵與區域正式制度的著墨卻顯得不足。各章中多從個案與議題實務層面探討出發，因此，雖豐富了討論的多元性，卻相對缺乏理論的建構與鋪陳，甚為可惜。特別是新區域主義的理論發展目前仍處初步階段，本書若能將其在實務個案探討的新發現對應至理論面的反饋，例如新區域主義的特色、演進方向、區域合作的本質、主要探討問題、以及分析途徑主要假設方面多作統整性的分析，或是以比較方式點出其他理論的不適用性，將更有助於釐清新區域主義發展的態勢為何。再者，由於書中關注的行為者不僅只有國家角色，非國家角色亦為重要，因此在分析單元比較複雜的情況下，對於這些行為者之間的相互關連並無很明確的闡述。然筆者瞭解其中的困難點在於必須更深入政策網絡詳細探討單元之間複雜的關係，故對此問題，筆者建議可另擇相關深入研究書籍補充閱讀。另外，本書的重點不在探討區域內正式機制之演進，但在論及亞洲地區的區域主義時，區域內正式機制的角色頗為重要。特別是近來東協加三朝向制度化的發展趨勢是相關研究者非常關注的焦點，並且，本書在論述中也時常提及區域正式合作機制與其他非政府角色的網絡連結。故為求更

精確地掌握本書內容，筆者建議讀者能先對東亞區域幾個主要的區域機制以及區域內國家有概略瞭解，再進一步閱讀本書，將更有助於釐清東亞區域整合的複雜脈絡。

高增杰

日本的社會思潮 與國民情緒

莊文一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所國關組碩士班

一、前言

中日交流自二千餘年前便已開始。日本對中國心嚮往之，對中國研究徹底之深，成果之繁精，令人印象深刻。反觀中國到清末為止，一直將之視為蕞爾小國而未曾認真看待過日本，這種天朝心態直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以「泱泱大國敗於蕞爾小國」的姿態，被迫與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舉國才正視日本的發展。而也因為甲午一戰，開啟了中國的「日本學」，對日研究成為一門重要學問。77 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論》中有一番振聳發聵的話：「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後，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曉得他的現在是從哪裡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然而 77 年過去了，對日抗戰至今也恰滿 60 周年，中國對日研究的水準又到達什麼境界了呢？

持平而論，中國大陸在對日研究上所投注的精力人力財力並不輸台灣，期間也有許多作品問世。其中獲中國社會科學院贊助、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社會思潮與國民情緒》可以作為近年來中國大陸對日研究成果的一個代表。該書非單由一人寫就，而是集合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學者如高增杰等共同編著而成。全書共分八個部份，除緒章與結論外尚有六章，分別論述考察日本



書名：日本的社會思潮與國民情緒

編者：高增杰

出版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2001 年

頁數：218 頁

ISBN：7-301-05114-X

社會思潮的方法、日本社會思潮的現狀與特徵、在 90 年代的轉變過程、構成社會思潮的社會基礎、以及社會思潮對日本國內與外交政策的影響。是一本對日本社會思潮與國民意向的總體研究。¹

二、本書論點

本書認為日本政治從 90 年代之後正歷經一場戰後最重要的轉變，而本書的命題為國民意志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政治層面的各種行動，自然影響日本政治動向。而日本國民意志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一定時期內的思潮動向，其載體為社會輿論。又國民意志在政治層面上表現為國民的選舉行為和政黨的政治行動，在經濟層面上表現為經濟發展活力和國民經濟增長的狀況(頁 7)。所以要觀察日本的轉變必須從日本國內政黨結構和階層的變動出發，從整體上分析社會思潮的特徵與變化。

在為自 90 年代之後日本的社會思潮定位及描述轉變時，將日本的社會思潮分成左翼和平主義思潮與右翼保守主義思潮兩類，並認為 93 年之前是「左右伯仲結構」，左派力量以及右派力量不分軒輊，93 年自民黨下台後左派力量並未增強，反而出現「保守化」的右傾現象，原本是右派中的少數激進派(保守傍流，也就是本書後稱的新興民族主義/新保守主義)勢力大

增。質言之，社會思潮總體右傾的象徵就是與戰前侵略性民族主義臍帶相連的新興民族主義(neo-nationalism)或稱為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興起，中曾根康弘的執政、倡導「政治總決算」以及日本民眾不再強烈反對修改憲法第九條即為例證。其原因可分為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國際因素是指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全球左翼力量減退；國內因素是因為自民黨下台，左派頓失攻擊對象而分崩離析反讓右派有成長空間。

至於日本社會思潮是如何右傾化的呢？本書以歷史分析途徑分析了從戰後 1950 年代到現今的社會思潮轉變。左翼思想特徵是護憲、和平主義，在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佔據社會思潮的制高點。但到了 1970 年末期出現衰退，原因在於日本經濟發展起飛，民眾財富迅速積累，出現所謂的「一億中流」以及「中流意識」(就是絕大多數的日本人認為自己不比人好也不比人差)，國民關心的對象從公領域移至私領域，對公共事務冷漠的結果就是使改新政黨的支持度下滑而自民黨的支持度則是逐年上升，並且過去相當一部份支持左派政黨者如今成為無黨派支持者。且因為經濟力量的發達，也開始想在政治上追求同樣成就(政治大國地位)，因此日本的社會思潮動向逐漸向右傾斜。新保守主義思想特徵是宣揚日本人民族優秀論、為二戰翻案、修憲、晉身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重整軍備甚至不排除持有核武，本書認為新保守主義思潮，實質上是一種大國主義思潮。

¹ 在進入本書內容印介前，須先向讀者提醒的是，本書一開始就已經把國民情緒與社會思潮混為一談(在目次就全盤使用社會思潮此一字眼)，從此看來，本書作者群並沒有也不想把這兩詞彙做意義上的分割與判明。因此為了客觀反映本書論點與關懷，本書評在此也不擬刻意區分這兩詞彙之意義。

社會思潮的右傾化、保守化也影響了日本國內政治的動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執行財政改革；第二，教育改革，特點在加強「愛國心教育」；第三，強調綜合安全保障戰略。至於在外交政策上的影響主要在於美日關係、日韓/日朝關係與中日關係三方面。在美日關係上，從依附美國但穩健建軍(吉田茂方針)轉變成希望與美國平等且積極擴充軍備，邁向正常國家。在日韓/日朝關係上，由於謀求在國際舞臺上有更大發揮空間，期望建立以日美歐三極主導的體系，日本必須改善與周邊關係。因此在對韓對朝戰略上，從接近韓國敵視朝鮮的「冷戰型韓國、朝鮮觀」轉變成因受大國主義思潮影響而對朝、韓「等距外交路線」的「後冷戰型韓國、朝鮮觀」。在中日關係上²，從冷戰時期的中日友好關係受到日本正常國家化思潮以及中國威脅論的影響而轉變成中日關係日見摩擦，但本書仍在最後認為日本社會思潮的主流仍十分重視中日關係以及兩國經貿關係緊密，所以「從總體上看，日本社會思潮依然具體積極的傾向，引導中日關係向健康方向發展」(208頁)。

總結上述分析，本書認為日本的社會思潮將有下列幾點走向：第一，日前的保守化趨勢將緩慢發展並短期內無法回流；第二，目前的保守化的主要特徵就是「大國主義」，也是逐漸佔據主流地位的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目標；第三，雖然和平主義思潮衰弱，但仍是制約保守化轉變的一股力量。

三、評論

藉由上述論點的重建，可以發現本書採用的研究方法著重結構變遷的分析，以歷史分析途徑著手，而分析單位就是階層，這是一種階級決定論，以馬克斯唯物史觀來分析日本各階級之思潮在不同時期對經濟與政治的認知及其變化如何影響日本政治發展。依本書對日本社會思潮結構的分類，則日本在90年代之前主要有兩股勢力，即左翼和平主義思想對抗右翼保守思想，整體社會結構是「左右伯仲結構」。而右翼思想當中又分成保守穩健派(保守本流，吉田茂及其後繼者為代表)以及保守激進派(保守傍流，中曾根康弘是代表)。90年代後日本社會思潮發生結構性失衡，左翼式微右翼崛起，且崛起的是保守激進派的勢力，高增杰等稱此結構性失衡是「保守化」，並認為此保守激進派的思想(新保守主義)在本質上與戰前的軍國主義、侵略性民族主義並無二異，所以對此感到憂慮。

此書的優點在於邏輯具有連貫性，將日本社會思潮的變遷與現象同時做橫向(同一社會不同階層單位的想法)與縱向(不同時序各階層的變化)的分析，並引列不少統計資料作為輔證。但此書作為對日本社會思潮的總體分析仍有其不足之處。

本書對於冷戰時期的日本社會思潮結構分類(左派、右派穩健、右派激進)可謂正確，而針對結構互動所提出的「左右伯仲結構」此一觀察亦稱精確。但本書以冷戰時期的分析框架作為出發，得出在冷戰後日本社會

² 此中日關係是指中共與日本的關係。

思潮保守化的結構變化是來自於左右失衡，原本屬於少數的保守傍流乘國內與國際結構變化之際大幅成長，一躍而為日本當前國內主流意識形態，並把此一意識形態與戰前軍國主義做一連結的這樣一個觀察卻不甚適當。

確實日本從戰後以來一直都有上述三種意識形態，長此以往均是右翼穩健派的意識形態執政，吉田路線或吉田主義即是此派的代名詞，但自 80 年代以來社會思潮的轉變並無法以固有的冷戰時期的分類方式來解釋，更無法將新保守主義視為在本質上與戰前的軍國主義及侵略性民族主義相通甚或相同的意識型態。以下將就三方面論述日本新保守主義的發展背景：就日本的發展方針來看，日本百年來的國益策略主要是脫亞入歐，對於歐美的思潮莫不加以關心模仿；就國際局勢來說，冷戰結束蘇聯垮台給了日本一個擴展國際政治地位的機會，而就國內因素來說，80 年代經濟上的高度發展也讓日本人自信滿滿地想要在政治上獲得相同地位，此為伏筆。90 年代後日本長期經濟不振的結果也讓新一代領導人開始思考日本的經營模式是否出了問題，於是從中曾根康弘已降的日本領導人借用西方的新保守主義，同時在內政與外交上尋求改變。總括來說，日本的新保守主義於 70 年代開始在國內生根，80 年代開始登場，直到 21 世紀初期已成氣候。因此從實存脈絡上看，這個思潮在概念上並不能被等同於軍國主義或侵略性民族主義，在發生原因與發展脈絡上也不能等同於此二者。

再者，於推論邏輯上，本書在此處亦夾帶了前提。在歸納日本民族主義思潮的歷史淵源時，從明治維新的侵略民族主義開始，經戰後轉折為健康的民族主義，再到 80 年代後的新興保守民族主義，並將此時的民族主義與明治時期的做思想上的連結。作者們沒有說明日本的民族主義發展在歷史上是否一致，並且忽略了明治時期當時日本與國際情勢和今日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若順著本書命題，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決定了特定時期社會思潮基本特徵與基本性質（132 頁），則為何能推論意欲在政治上爭取大國地位、邁向正常國家的新保守主義思潮就是戰前那個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的返魂呢？令人不禁懷疑本書為日本新保守主義的定位是否受到先入為主的偏見所影響。

此外，本書也處處可見受到特定意識型態影響下對於日本不同思潮的特殊價值判斷。數縈縈大者即在描述左右兩翼思想時，並稱左翼為「和平進步思想」，反稱右翼為「保守的、窮兵黷武的」，讀者多能從中感受到本書作者對左翼思想採用較為正面的評價而對右翼思想多持負面。我想這對客觀分析日本社會思潮結構並無任何實質幫助，算是本書的一個瑕疵。

最後，本書對於 93 年自民黨下台後為何左翼反而分崩離析的解釋並沒有抓到重點。就國內因素而言，並非如本書所言左派頓失攻擊對象而導致崩潰，而是當時社會黨的村山富市瞞著其他反對勢力連夜與已敗選的自民黨協商，最後協商出一個自民·社會

聯合政府，條件就是讓村山富市擔任首相！翌日消息傳開，輿論莫不譁然，固然同屬反對勢力的其他各小黨憤恨不已，導致日後反對勢力分崩離析，就連媒體也以「野合」（やごう）³來形容這次聯合政府。當然這得利最大自屬自民黨。在這之後的日本政壇，不管是反對黨陣營的領導權或者執政黨都被自民黨人或前自民黨人所囊括，這也就是本書所說的左右翼結構失衡的開始。

³ 據日本最大辭典《廣辭苑》的定義，野合就是「沒有經過正常手續而有男女關係」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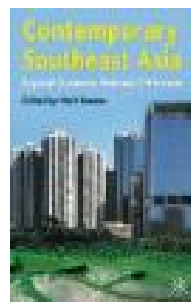
Mark Bees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Dynamics, National Differences.

楊 昊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所國際關係組博士生

目前「國內」東南亞研究的著作與論述導向，多以各國政治體制之比較，區域經濟整合之分析，抑或東南亞社會文化、華人政治經濟活動與晚近新移民問題之探討為主要範圍。相較於此，「國際性」的東南亞研究所關心的議題與範疇則相對廣博，以環保、非政府組織、災難管理以及認同問題為題的研究論著亦常見於各重要期刊與專書中。本書正反映了此種多元議題的研究趨勢，以區域動態（regional dynamics）為貫穿全書之主軸，佐以不同論者對於歷史、政治、意識型態、經濟、社會、宗教、外交與安全、環境、國際關係以及制度演進等議題之分析，進而描繪出亞洲學者眼中的東南亞實際風貌。

Beeson 開宗明義地指出東南亞各國在種族、宗教、政經環境與社會結構方面時具歧異性，但這樣的多樣性並未損及東南亞地區在近二十多年來的活躍發展（p. 1）。為了使讀者能在初始研究之際跳脫傳統的東南亞各國殊異比較之龐雜體系，並能清晰掌握東南亞區域發展之系絡，本書試以「區域層次」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來勾勒各個議題上的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發展過程，進而呈現出東南亞特有的國家差異（national differences）與區域動態。儘管本書為彙整過的論文集，然而每篇論文在行文與分析中大多能一貫地緊扣 Beeson 的概念框架，其分析理路如後文所述。



書名：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Dynamics, National
Differences
編者：Mark Beeson
出版者：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地：Houndmills
出版日期：2004 年
頁數：288 頁
ISBN：1403934754

壹、追本溯源：受到共同歷史經驗影響的區域化過程

要探討東南亞區域動態，各國受歐洲列強統治的殖民時期實為重要轉折 (critical juncture)。從歷史的角度來看，Robert Elson指出東南亞地區的認同問題其實與各國殖民時期的遺緒有關。類似的被殖民經驗對當代各國經濟與政治結構上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同時亦賦予重塑東南亞區域新認同的機會 (pp. 15-29, Ch.1)。進一步回顧二十世紀的東南亞發展史，Mark T. Berger把焦點置於冷戰結構下的東南亞國家解殖 (decolonialization) 運動，強調儘管一般認為全球冷戰體系之結構限制了該區域之發展，但是在國家層次上諸如馬來西亞、印尼與印支半島所追求的獨立建國運動，其實才是構成此時期區域動態發演進之關鍵因素 (pp. 30-49, Ch. 2)。¹上述政治發展過程對於後期的東南亞區域整合之實踐影響甚鉅，特別是自 1980 年代以來的經濟起飛時期。鑑於此，Greg Felker將焦點置於區域經濟的宏觀演進上，針對 1960 年代的進口替代到 1980 年代的出口導向之工業化發展過程、晚近藉由東協自由貿易區 (AFTA) 以及東協與亞洲各國的策略競合關係所發展的新區域主義 (New Regionalism) 進行分析。Felker指出 (1) 東南亞區

域對外來勢力影響的回應，以及 (2) 區域內部多國合作機制的落實間的複雜互動，將有助於晚近區域經濟之整合發展 (pp. 50-74, Ch. 3)。

貳、分而不離：東南亞區域特有的價值、文明與政治社會型態

對於東南亞新興國家而言，西方民主與亞洲價值 (Asian Values) 間的關係常見於過去的文獻中，相關分析亦可在 William Case 撰寫的第四章中獲得說明。Case 透過民主品質的評估來分析新、馬、印、菲、泰等五國的民主演進與改革進程 (pp. 75-97, Ch. 4)，Chua Beng Huat 則在第五章中以新加坡的個案來探討亞洲價值與威權主義 (authoritarianism) 實為東南亞特有的文化歷史因素對各國政治、社會所造成的體制與價值影響 (pp. 98-117, Ch. 5)。除了民主化議題外，諸如全球化下的勞工運動與政治權力間的關係 (pp. 118-135, Ch. 6)、以及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社群在國內政治與外交、經貿事務上的角色 (pp. 136-155, Ch. 7) 均彰顯出東南亞區域在 1980 年代之後因經濟快速成長所帶來的種種社會與環境影響，以及因宗教而起的衝突與和解問題對於區域內國家互動的關鍵性。

參、趨同遠景：區域內、外壓力下的集體行動

過去的殖民經驗與國家各殊性豐富了 Beeson 及其他亞洲學者所揭櫫的東南亞動態；直至近期，整個區域動態的發展在兩股力量——區域內共同安全關注的深化與擴大以及區域外勢力的嘗試介入——的作用下，重新描繪出

¹ 或許Berger的論點看似單純，讀者可能不易察覺其弦外之音。Berger的觀點係循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第二意向反饋」(second image reversed) 途徑，透過在地解殖運動的歷史研究，間接駁斥了不少以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t) 之國際體系決定論的邏輯來分析冷戰時期的東南亞區域動態的論述。Berger一文除了描述東南亞的解殖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亦將區域層級的分析從傳統結構現實主義的結構決定論中釋放 (released)。

東南亞區域發展的新圖象。於此，Alex J. Bellamy 以超越現實主義 (beyond realism) 的安全觀來回應上述的**第一股力量** (pp. 156-177, Ch. 8)。Bellamy 從解殖運動對區域安全的影響切入，探討了內(諸如國內種族衝突)、外(中國威脅與南海爭議等)部威脅，這些威脅成就了東南亞政治菁英眼中的另類安全問題 (alternative security problems) (p. 163)。為了要追求安全，實有賴共同規範、區域制度以及認知社群等因素之促成。Lorraine Elliott 循相同邏輯針對因經濟成長與社會發展所引起的環境安全問題進行分析，並藉以勾勒出東南亞在政治、經濟之外的另一項重要安全關注 (pp. 178-197, Ch. 9)。他認為諸如水資源問題、湄公河開發計劃等議題都將會形成催化區域內部之衝突與緊張的安全威脅 (p. 187)。針對**第二股力量**的解釋，Mark Beeson 以美國(全球佈局)、中國(大戰略規劃)與日本(經濟領銜)等強權與東南亞區域間的關係，來解釋內置於國際政治結構中的東南亞區域動態 (pp. 198-215, Ch. 10)。此一回應式的區域動態發展為 Richard Stubbs 一文埋下伏筆，Stubbs 以東協的發展作為解釋晚近東南亞區域動態的關鍵因素，文中回顧了東協從早期到東普寨危機的發展歷程，並就 1980 年代因經濟起飛始見於世界舞台的發展榮景，及晚近以東協為核心的各種區域合作機制之落實進行說明 (pp. 216-233, Ch. 11)。

綜上，Beeson 透過「早期共同殖民經驗的回顧」到「晚近區域合作機制的分析」此一時序上的演進，結合

不同專長的學者透過各種重要議題的分析，來詮釋東南亞動態發展的進程。讀者可以發現全書因涵蓋議題極廣，因而無法以某個艱澀的理論(如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或現實主義)作為貫穿各章節的知識論基礎；同樣地，在論述上亦未以某種特定的意識型態(如資本主義或馬克斯主義)作為論證之依據。從實用主義者 (pragmatist) 的觀點來看，全書之題旨係作者群期待以「立足區域，回顧各國，面向全球」的邏輯來讓讀者理解「當代」東南亞的各種特色。立足區域指的是 Beeson 所言之「以區域為概念架構」的分析出發點；回顧各國指的則是透過各國在議題上所呈現之異同性的比較分析，進一步豐富讀者對於區域動態的認識；最後，面向全球則如同 Beeson 等學者曾主張之「回應式區域主義」 (responsive regionalism) 概念，強調區域化過程的種種落實其實可以被視為是對於全球化外來衝擊的回應，而此種半開放式的區域體系分析實與 Barry Buzan 所提出的區域安全複合體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之發展系絡有異曲同工之意。²

此外，細讀全書後讀者可隱約理出晚近東南亞綜合安全 (comprehensive security) 概念之興起背景及其演化理路。東南亞國家在後殖民時期 (post-colonial period) 醞釀出特殊的區域歷史與共同記憶，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中形塑了區域層級

²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Lynne Rienne Publishers, 1991).

的共同目標與理想，從而建立了一套囊括多元面像的安全思維。東南亞國家在各種條件上儘管多顯歧異，為了落實這套思維同時為了追求區域內部的穩定並在國際競技場上能有一席之地，各國在區域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過程中將透過具有區域淵源的機制來尋求各種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的務實辦法，從而建立了特有的東協模式(ASEAN Way)——一種保有單元各殊性卻又能彼此緊密相聯的集體行動邏輯。換言之，要瞭解東南亞區域在近十餘年來的最新發展趨勢，Beeson所秉持之概念架構切入理解，或將能有效梳理區域內外之種種複雜互動，轉而超越因各國殊異而有可能失焦的論述或分析。

Beeson以各種議題為經、循歷史脈絡為緯的論述架構，而此一架構正揭示了前文所強調之「由分歧到聚合」的發展過程。全書在鋪陳上透過各種重要議題的發展來說明「國家差異」與「區域動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而這種互動關係的表現則是透過歷史回溯的方式來呈現；爰此，各個作者均循著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行文方式嘗試描繪出當代東南亞發展的歷史淵源。³透過橫切面的議題分析再佐以縱貫面的歷史演進，讀者將能瞭解東南亞整體(Southeast Asia as a whole)在政治、經濟、社會與安全上的全觀樣貌，而兩者交織而成的分析

介面，方能盡量提供東南亞研究的整體圖象。更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出版的本書實囊括了不少2000年後的最新區域動態分析與說明，特別是對於備受矚目的東亞經濟整合進程及其延伸意涵，均提供了不少的新資訊。

本書對於初次瞭解東南亞區域的讀者而言，可作為一本瞭解區域發展概貌並尋找讀者自身之研究議程的基礎書籍。除此之外，本書所涵蓋之各章節的結語處，亦附有1990年代末期至2000後的重要延伸閱讀書目，讀者可用以延伸瞭解相關議題或學理之種種發展。對於進階讀者而言，本書提供了不少亞洲學者(新加坡、澳洲、香港等)對於東南亞區域所特有的自我見解與專業知識之展現(representation)；就此，讀者將更能藉由本書來掌握「更具亞洲色彩的」東南亞區域風貌與歷史系絡。不過，本書或因篇幅考量，所述及並深入探討的議題仍未臻窮盡，儘管作者群嘗試以豐富的國家差異之分析來補充區域動態的發展，然對於部份進階讀者而言可能稍嫌不足。除此之外，全書在編彙上另一個遺珠之憾，即少了一章從事學理研究與經驗分析之省思的結語；若本書能進一步點出西方學理在東亞區域研究與應用中所可能面臨之限制、挑戰並予以評述，或者對東南亞區域動態的未來發展趨勢有更強之預測性或指示性(prescriptive)之說明，則將使全書之知識體系更臻完整。

³ 路徑依賴是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中的歷史制度論學者(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所常運用的溯源分析方式，可見：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5 (1996), pp. 936-957.

長篇書評

建構區域安全— 安全分析的另一種途徑

許文妍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所國際關係組碩士生

安全研究是國際關係研究中相當重要的領域，而學術界對於安全的本質及其內涵歷經諸多討論後產生了不同的觀點。尤其隨著美蘇強權對峙的冷戰時期結束後，不少學者提出了擴展的安全內涵，以修正傳統現實主義 (realism) 的安全觀，並促使相關研究興起了更為多元之辯論。在安全所囊括之內涵的逐步擴展下，越來越多學者針對區域安全的秩序之建構進行焦點分析，其中「安全社群」(security communities) 及「安全複合體」(security complex) 等學理概念即提供了區域安全建構的另一種途徑。然而在國關研究領域中，並不擅長以「社群語言」(community language) 進行分析，本長篇書評則嘗試以三本著作帶領讀者進入安全社群研究領域，本文探討脈絡如圖一(示於下頁)。

早在 1957 年，學者 Karl Deutsch 即提出「安全社群」之要義，¹他從歷史案例中觀察到一種「安全社群」型態，極有可能在未來成為避免戰爭的政治社群，從而得以獲致安全，並據此對北大西洋之區域形勢進行分析。然而，隨著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議程的轉變、國際安全概念的多元化，再度點燃了學術界針對 Deutsch 「安全社群」概念之研究興趣，

¹ Deutsch, Karl Wolfgang (1957),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書名：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作者：Karl Deutsch

出版者：Greenwood Press.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1957 年

頁數：288 頁

ISBN：1403934754



書名：Security Communities

編者：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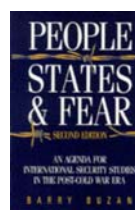
出版者：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Houndmills

出版日期：1998 年

頁數：482 頁

ISBN：0521639530



書名：People, States, and Fear

作者：Barry Buz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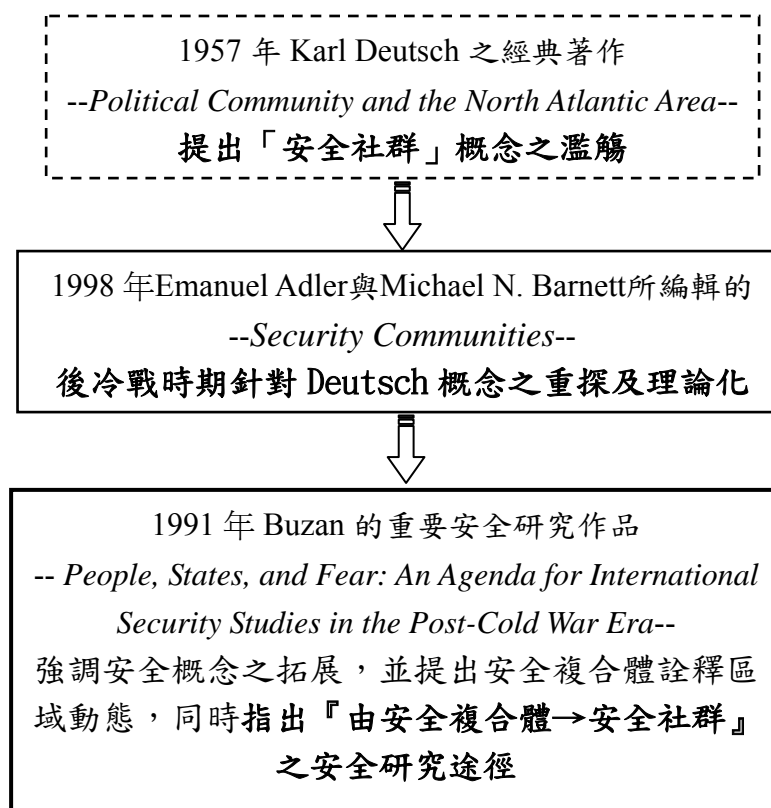
出版者：H L. Rienner Boulder

出版日期：1991 年

頁數：482 頁

ISBN：1555872824

由安全複合體邁向安全社群之區域安全建構途徑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一)

其中 Emanuel Adler 與 Michael N. Barnett 所編彙之著作¹正為相關討論的經典之作。全書除了回顧 Deutsch 的安全社群概念外，更提出安全社群的發展「三階論」，並彙集其餘作者以安全社群之概念進一步分析區域安全的建構。該書不僅使安全社群概念更為豐富且完整，同時亦結合了經驗上的深入探討，可謂在安全社群研究中最具系統性的著作。

除了 Adler 與 Barnett 在安全社群研

究上的重大貢獻外，「哥本哈根學派」²的領導者 Barry Buzan 在 1980 年代提出了「安全複合體」概念，做為區域安全建構之關鍵分析架構途徑。該學派的安全觀點可以 Buzan 的著作—*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³為代表，該書批評

¹ Adler, Emanuel and Michael N. Barnett (1998), *Security communitie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²由丹麥哥本哈根「和平暨衝突研究中心」(Center for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研究員所組成的「哥本哈根學派」，自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即主張安全研究在焦點及層次上皆有擴展的趨勢，此一學派之代表學者包含 Barry Buzan、David Baldwin、Ole Wæver、Joseph Nye、Richard Ulman 與 Sean Lynn-Jones 等大師級人物。

³ Barry Buzan (1991),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傳統式的安全研究為維持現狀之安全觀及軍事面向的安全政策所主宰，而減弱了研究分析的品質。鑑於此，Buzan提出「安全複合體」概念作為安全分析的架構，⁴其意涵為『地理上接近的一群國家間，形成了有重要影響和特徵的安全聯繫，在安全事務上有高度相互依存關係』，Buzan便以此一區域安全複合體來作為建構區域安全之另一種分析途徑。⁵

相較之下，「安全社群」概念無論在社群內的互賴程度、社群感或社群內的規範方面，皆較「安全複合體」概念來的更為深入且廣博，因此Buzan也表示「安全社群」可能成為「安全複合體」演化後的一個理想模式。在整個發展系絡上，誠如學者Björn Hettne所言，此種「安全區域主義」(Security Regionalism)的發展進程，實由「區域安全複合體」經過區域安全秩序的建構，而逐步邁向「安全社群」。⁶爰此，筆者意圖以「安全複合體」及「安全社群」概念作為分析區域秩序建構之兩大概念主軸，依序介紹Deutsch、Adler and Barnett至Buzan的三本著作對於區域安全研究之主要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 : L. Rienner
 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台北：時英，2003)，頁230-233。

⁴ Barry Buzan,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Fredrik So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p.140-159.

⁶ Björn Hettne, "Regionalism,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Björn Hettne and Andras Inotai eds., *Comparing Regionalism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p.13.

貢獻，並探討安全社群概念之演化，直至由安全複合體邁向安全社群的區域安全建構分析途徑。

一、安全社群概念起源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安全社群」概念最早是由所Karl Deutsch在1957年提出並進行理論及經驗的整合。Deutsch於冷戰氣氛嚴峻的1950年代，仍藉由研究區域統合(integration)之邏輯來思考以非戰方式來解決彼此差異及糾紛之可能性。而他對於區域安全理論之最大的貢獻為其1957年之專書中所提出安全社群分析架構之濫觴，更影響了後世學者的相關研究與理論發展導向。

Deutsch在書中以安全社群概念架構分析北大西洋區域內部國家間的統合趨勢；全書共分為四個部分，首先談論安全社群的背景條件(background conditions)及統合過程(integration as a process)；緊接著在經驗上採用當時北大西洋區域的國家進行概念之驗證；最後一部分則討論其政策意涵。在概念上，Deutsch挑選歷史上北大西洋區域內的十個統合案例，希望藉由歷史經驗來推測可能的區域安全安排(arrangements)，並期望能以古鑑今。

為了尋求維繫區域安全的理想模式，Deutsch在歷史案例中觀察到一種

具有「安全社群」特徵之政治社群型態，意指「一組人在特定領域內歷經統合後，此一社群之成員萌生「社群感」，並對於和平變遷（peaceful change）具有可靠的預期。」其中，有兩個部份值得注意：第一，「社群感」（sense of community）意指群體內之單元確信共有的社會問題，將會透過「和平變遷」的過程而獲得解決。第二，上述定義中的「和平變遷」則是指社會問題的解決，通常是未經過大範圍物質力量，而透過制度化階段所解決的過程。簡言之，一個安全社群即是「一組成員經整合後，確信彼此將以其他方式取代戰爭來解決彼此的爭端」（p.5）。

除了提出安全社群之定義，Deutsch 進一步將安全社群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為「合併安全社群」（Amalgamation）--兩個或多個獨立單元經正式融合，成為較大的整合單元；在融合後可能將具有某種類型的共同政府作為最高決策中心，例如美國；第二種類型則是「多元安全社群」（Pluralistic Security-Community）--在此一政治社群中，國家仍保有其主權（p.6）。Deutsch 表示無論是合併或多元安全社群，皆為邁向統合的實際路徑；不過，相較於合併安全社群而言，多元安全社群在實際操作上則較可能達成並加以維持（pp.28-29）。此外，他回顧歷史後亦發現多元安全社群確實較有可能成就出未來以非戰方式解決爭端的途徑。不過，在安全社群建立之際，「社群感」的建立與凝聚在跨國統合的過程中則均不容忽視。所謂「社群感」指的是來自於成員間之溝

通與交流而形成某種程度之相互忠誠與同理心（sympathy），以及有「我群感」（we-feeling）信任與相互行為考量。這是一種長期注意、溝通、需要之察覺以及責任的動態過程，而社群成員對「和平變遷」的確信則無法在不具有如此關係之情況下建立。（p.36）換言之，上述社群內部認同形塑之動態過程，為「社群感」之重要內涵，以及達成確信「和平變遷」之重要途徑。

此外，Deutsch 指出多元及合併安全社群之建立有兩個必要條件（essential conditions）：1. 主要價值的協調（compatibility of major values），包含有政治思想體系、經濟體系及宗教價值的協調；2. 相互支持（贊同）（mutual responsiveness），經過社群感、密切的溝通及（人員、物力、服務及意見交換等）交流而達成。八個合併安全社群建立之基本條件：1. 特殊的生活方式；2. 推動統合的核心區域；3. 高度經濟成長；4. 共同經濟報酬的期待；5. 大範圍的相互交流；6. 菁英的拓展；7. 社會溝通的聯繫；8. 人員的流動。以及四個對合併及安全社群有幫助但非必要的條件：1. 不情願發動戰爭；2. 外在軍事威脅；3. 強烈的經濟聯繫；4. 種族及語言的同化。（p.123-158）整體而言，以上十四個條件為安全社群建立之必要條件及有益的條件，Deutsch 以此為標準檢驗北大西洋區域，發現其中僅有兩個國家對區域關係符合大部分條件，區域內的其餘國家可能僅符合六個必要條件，且其中政府間的相互支持又是對統合而言相當重要的一個關鍵要素，在北大西洋

區域已有許多國家間形成多元安全社群，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p.199)

Karl Deutsch 作為交流理論 (Transactionalism) (或溝通主義、多元主義) 相關研究之主要代表學者，重視統合過程中人力、物品及意見大範圍之交流及溝通，1957年出版之專書被視為交流理論觀點之主要著作，⁷而Deutsch對於區域安全研究領域最主要貢獻則為，首先完整探討(提出)安全社群概念及其運作模式、並以北大西洋區塊為例提出建立安全社群之主要條件等，希望藉此為現實主義之外的安全維繫方式找到新的出路。更重要的是，Deutsch之安全社群概念於當時雖未發展成為完整之學理概念，卻於冷戰後再度引起學術界廣大迴響與討論，諸多學者則以Deutsch概念為立基，發展更為完整之區域安全研究途徑。

二、安全社群概念的重探與發展

Security Communities

後冷戰時期，國關研究議程始有轉換，在各種新刺激的影響下，學界又再度興起對於Deutsch之安全社群概念的討論。⁸由學者Emanuel Adler與Michael N. Barnett所編輯的*Security Communities*⁹一書中不僅重新提起

Deutsch的安全社群概念，更深入發展理論層面的完整性，以促使「安全社群」概念得以逐步發展為安全研究之分析架構。Adler及Barnett提出安全社群發展之「三階論」(three-tier model)使安全社群概念更臻完整，對於安全區域研究領域而言，無疑是一大貢獻。他們表示重新採用安全社群概念，並非要帶領我們朝向浪漫主義，反之是希望藉此使大家瞭解到以安全社群來詮釋目前國際現勢之重要性。

整體而言，Adler及Barnett一書對於建構區域安全秩序之主要貢獻包含兩部分；第一部份之貢獻主要在於對四十年前的安全社群概念進行理論重探；第二部分則是透過集結學者針對各區域、國家的探討，重新將修正後的理論加以應用。此外，兩位編者更是試圖將「安全社群」概念發展為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之研究綱領(research program)，以豐富國關理論中的建構主義途徑，以及區域安全之動態分析。

然而 Adler 及 Barnett 嘗試於Deutsch的研究基礎上，進行安全社群概念之論述。全書在分析上強調：安全社群的特徵、概念意涵及安全社群概念的發展。Adler及Barnett首先界定多元安全社群的特徵如以下三點：1. 社群成員擁有共用的認同、價值觀和意義；2. 其成員擁有多方面直接的聯繫和互動；3. 該社群展現出一種在面對面接觸中產生的、通過某種程度的長期利益和利他主義表現出來的互惠性，這種長期利益源於互動產生的知識，而利他主義可以理解為一種義務和責

⁷ Ben Rosamond,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0), pp. 43.

⁸ Ben Rosamond, *Ibid*, p.169

⁹ Adler, Emanuel and Michael N.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任 (pp.30-31)。再者，Adler及Barnett表示各種社群皆有其特質，不同社群會建立不同處理爭端的機制，而**安全社群與其餘社群不同的特質在於——安全社群內成員維持和平變化的可靠預期 (dependable expectation of peaceful change)**。他們強調的「**和平變化**」與Deutsch一致，均指成員之間不以戰爭作為解決國家間衝突的手段。而「可靠的預期」則可以由社會互動理論來解釋，即藉由成員間共同價值認同、溝通和利益所構成之社會環境。也就是說，安全社群內可以不存在高度發達的戰略聯繫或正式聯盟，但必須有禁止通過戰爭手段解決國家間爭端的法律上的或正式的規範 (p.33-34)。

此外，Deutsch將安全社群分為多元及合併安全社群，而Adler及Barnett又再將多元安全社群細分為「鬆散的」(loose)及「緊密的」(tight)兩種理想類型。前者擁有多元安全社群的最基本特質，即主權國家構成之跨國家區域，其內部人民對於和平變遷維持可靠的預期。後者除了基本特質之外，強調社群內部將建立集體系統安排，形成「互相幫助」(mutual aid)的社會。此外，該社群內並實施某種規範系統，這種規範是介於主權國家及區域之間的一種集體安全系統 (p.30)。除了更細緻的分類之外，**Adler及Barnett並提出三階論 (three-tier model)以解釋安全社群的發展過程。第一級階梯為加速基本條件 (precipitating condition)**，包括科技、人口、經濟與環境中的變化，社會現實新解釋的發展及外在威脅這些

因素促進國家擴大面對面的互動、對話和合作。**第二級階梯為結構變數及過程變數**，前者包含權力、知識，後者包含交易、組織和社會學習等變數。**第三級階梯則是建立相互信任和集體認同**(p.37-47)。一方面，他們所預見的是核心權力與認知結構間之動態且正向的關係發展；另一方面，並將組織、社會學習以及交易等變數納入考量。這些變數之間的動態互動，由下而上地支持信任與集體認同過程的構成，藉此則逐步形塑了社群內部和平變遷之可靠預期 (p.48)。作者們藉由變數間互動之動態過程，清楚地展現安全社群發展之脈絡軌跡，由下而上地達到社群內部相互信任與認同之理想模式。

最後，由於Deutsch的概念僅可被視為是分析架構 (framework)，分析社群之存在與發展對國際政治及安全的影響為何，而**Adler及Barnett則提出安全社群發展的三階段——「初始期」(nascent)、「上升期」(ascendent)、「成熟期」(mature)**，並提出各階段之指標，及考慮安全社群去統合化 (disintegration) 的可能性，期盼能藉此促使安全社群「概念」朝「研究綱領」邁進 (p.48-49)。

在章節安排上，Adler及Barnett在第一個部分中將安全社群概念內涵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使安全社群概念內涵更為完整及精緻。在第二個部分中，則收錄了九位學者以安全社群概念進行經驗上的研究，研究案例包含有歐洲、南美洲、東南亞、澳洲、美國-墨西哥及美國-加拿大等地區安全

社群的建立過程，及第十章談論民主、互賴與國際組織在安全社群建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學者Andrew Hurrell、Sean Shore及Richard Higgott and Kim Nossal皆採用歷史分析途徑，分別探討南美洲區域、美國-加拿大是否為安全社群，及澳洲過去參與美國安全社群，到未來可能轉向亞洲太平洋安全社群之現象；而Emanuel Adler、Amita Acharya及Guadalupe Gonzalez and Stephen Haggard則分別探討區域組織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東南亞國協（ASEAN）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FTA）與區域安全社群建立及發展之間的關係。比較特別的是學者Ole Wæver以西歐地區為範例，運用安全社群概念予以檢驗，然而其觀點則與Adler及Barnett有明顯不同，Wæver認為西歐會成為安全社群是「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的結果，在這過程中個別國家對於軍事安全之疑慮，多轉換為經濟、環境及移民之安全考量。Wæver將「去安全化」過程分為「不安全（insecurity）→安全（security）→無安全（asecurity）」三個階段，並指出安全社群可以被建構，同時也可以被解構，即安全社群發展的第四個階段--「再安全化」（resecuritization），並且以「去安全化」過程檢驗西歐安全社群之發展。

綜上所述，由Adler與Barnett所撰寫並彙整之專書，實為目前安全社群研究中最為系統化且完整之著作，基本上兩位編者針對安全社群之論述，仍以Deutsch於1957年所提之學理概念為基準，有關安全社群之特徵及概念意涵並未進行大幅度變更，而其論述

及研究最重要貢獻則是在於提出更深入之「三階論」論述，使得安全社群之發展內涵更為完整及豐富。除了豐富安全社群之學理概念外，Adler與Barnett更結合了諸多學者之實際運用，希望將安全社群建構模式發展為建構主義學理系絡中之研究綱領，也促使區域安全研究中更為多元之思考。

三、從安全複合體到安全社群

People, States & Fear :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經過1950年代安全社群概念之源起，到1980~1990年代學術界重啟安全社群概念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學者Barry Buzan所提出的安全複合體概念，實為此一發展系絡的重要里程碑，此一概念鋪陳了由「安全複合體」至「安全社群」之系絡，並提供了建構區域安全的完整邏輯。Buzan在安全研究領域中之主要貢獻在於提出了安全擴展的概念以及將「安全複合體」做為區域安全的多層次（multilevel）分析架構。其中，Buzan在1983年的著作--*People, States & Fear*即為「哥本哈根學派」的主要安全論述基礎，在1991年再版的*People, States &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一書中，Buzan又將安全研究概念以及區域安全複合體概念進行更完整的詮釋與說明。Buzan批評傳統的安全研究主流將安全侷限於權力及和平兩個意涵當中，他認為安全概念應該比權力概念

更為多變 (versatile)、具有穿透力 (penetrating) 並作為研究國際關係領域有益的研究途徑 (pp. 2-3)。尤其在國際環境快速變動的特質下，吾人必須具備一個更廣泛的安全觀點，而非傳統專注於討論國家軍事安全的狹隘概念 (pp.14-15)。因此 Buzan 將安全研究分為五個領域--**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和環境** (pp.19-20)，並藉此分析安全的指涉對象：由個人→國家→**區域**→國際層級。我們可發現安全有許多潛在 (potential) 的指涉對象，指涉對象擴展的原因在於國家社會成員的增加，以及研究層次向上擴展到國際層次，向下則擴展到個人層次，而每個指涉對象又不得互相獨立，這些層級間的安全互相牽連 (p.26)。

然而在區域安全研究方面，Buzan 表示傳統對區域安全研究方面缺乏一套完整的分析架構及分析途徑，甚至忽略區域層次的安全動態。諸如 Michael Hass 等學者也僅以「任何國際體系的次組合」(any subset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概念廣泛定義區域 (p.187-189)；因此，Buzan 提出了「安全複合體」概念，並藉此分析區域安全秩序的建立與發展。安全複合體的基本邏輯是系統中的所有國家均被捲入全球安全互賴的網絡中，而地理上接近的一群國家之間形成有重要影響和特徵的安全聯繫，在安全事務上有著高度的相互依存關係。而**傳統安全複合體的定義是——地理上接近的一組國家，其主要安全認知與考量互相緊密連結，以致於他們的國家安全問題無法在彼此之外合理地分析或**

解決¹⁰ (p.190)。

Buzan 除了賦予定義之外，更表示安全複合體所擁有之多重意涵，首先安全複合體為一個區域分析架構，概念上有助於區域層次上的分析焦點，並彌補傳統以「任何的次組合」之概念籠統分析區域層次之缺憾；其次，安全複合體又是一種經驗的現象並有著地理及歷史的深刻淵源。再者，安全複合體的構成又是連結國家層次與國際層次，國際層次之無政府狀態提供了安全複合體的背景脈絡，而地理的接近性及國家間的互動則形塑安全複合體之型態 (p.191)。於安全複合體之諸多意涵中，可見 Buzan 所強調之安全多元概念，而安全複合體也正座落於複雜且多元之安全網絡當中。

瞭解安全複合體之基本內涵之後，Buzan 則指出形塑**安全複合體基本要素在於：安全互賴、區域內的權力結構、以及特定地理區域內的善意 (amity) / 敵意 (enmity) 關係**。如此的安全複合體不僅是在競爭上的相互依存，也是共享利益的相互依存關係。而善意/敵意概念也可被視為權力平衡的產物，或是權力平衡的新抽象

¹⁰ 所謂傳統的安全複合體概念，指的 Barry Buzan 於 *People, States & Fear* 書中對於安全複合體概念之定義，然而隨著區域主義及區域安全化的思維逐漸發展，Buzan 在 1998 年出版的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一書中，針對安全複合體的意涵進行修正，新的標準定義為一一組單位，其安全化 (securization)、去安全化 (desecurization) 的主要過程如此相互連結，以致於他們的國家安全問題無法在彼此之外合理地分析或解決。請參見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eds.,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概念。在過程中，善意與敵意可能從很多種議題中產生，範圍由細微的民族血緣關係、邊界糾紛、意識型態結盟，廣泛到長期的歷史聯繫，如阿拉伯與猶太民族。Buzan 認為，安全複合體是經由獨具區域特色的權力分配和善意/敵意所形塑而成的，透過國家間的互動所產生。諸如此類的安全互賴關係，則是來自對威脅、恐懼的認知，與善意/敵意途徑所驅動的。在後冷戰時期，儘管鮮少出現大規模戰爭，但國家可能仍將彼此作為潛在威脅對象，而國際間若朝向構成安全複合體發展，將能有助於降低威脅、共享利益之區域安全建設 (p.190)。

瞭解安全複合體概念內涵之後，Buzan 又提出界定安全複合體的標準，主要界定方式在於不同國家間的安全互賴程度。安全互賴程度之強弱將影響安全複合體之型態。此外，複合體內的國家間互動明顯比對複合體之外的國家或區域來的強烈 (p.192-193)。Buzan 在論述中強調，在分析特定安全複合體的同時，除了傳統的軍事與政治方面的關注外，經濟安全因素亦是不容乎視的關鍵 (p.202)。至於文化與種族是否為界定安全複合體的因素之一，Buzan 則認為在一組國家間共享文化與種族特徵似乎無法促使彼此注意彼此的安全事務，特別是合法化干涉彼此安全事務的行為。實際例子可在阿拉伯、拉丁美洲及伊斯蘭區域中發現，這些國家儘管具有類似的文化因素，但並未因而加速並合法化相關國家間的安全互賴程度 (p.196)。

最後 Buzan 表示，安全複合體在其基本結構—權力分配及善意/敵對模式改變之同時，將產生四種安全複合體轉換的結果：維持現狀 (Maintenance of the Status quo)、內部轉換 (Internal)、外部轉換 (External transformation)、及覆蓋 (Overlay)。安全複合體除了可能轉換之外，也可能進行演化，在安全複合體的演化過程中 Buzan 指出複合體的發展中存在一個可能性的光譜，由混亂 (chaos) 到安全社群 (security community) (p.218)，也就是安全複合體可能呈現衝突面向，也可能會朝向理想模式也就是安全社群的方向邁進。同樣地，新區域研究學者 Björn Hettne 也指出，由「安全複合體」邁向「安全社群」的過程，即為所謂安全區域主義的發展進程，也為本文所欲探索之區域安全建構的另一種分析途徑。

四、結論

隨著全球化現象之衝擊及冷戰之結束，國際安全研究也跳脫了簡約 (parsimonious) 之新現實主義研究途徑，轉而強調更為多元及擴展之安全觀，此時國際區域層次的安全秩序建構也逐漸吸引安全研究者的目光及興趣，而由「安全複合體」演化至「安全社群」型態之區域安全建構，更為區域層次中相當理想之安全分析途徑。然而「社群」研究仍並非國關研究者所擅長之語言及分析工具，本文嘗試集結三本與安全複合體發展至安全社群研究途徑相關之重要經典著作，目的在於引領讀者們對於後冷戰時期安全概念拓展下的另一種區域安全分析途徑有更深刻之瞭解，而本文

強調的是安全研究演化之脈絡：「由安全社群的濫觴→後冷戰時期安全社群的重探→到安全複合體邁向安全社群」如此一種完整的區域安全分析途徑，而為使讀者更易於瞭解，於文末之表二則進行本文主要三本著作之概念比較。

依序閱讀Deutch、Adler and Barnett至Buzan之著作，將帶領有興趣之讀者，漸進式瞭解區域安全之建構：安全複合體→安全社群的安全分析途徑。首先Deutch於1957年所著之專書中，雖然僅提出安全社群之概念雛形，然其對於後世學者在區域統合及安全建構之概念啟發，則絕不可小覷；如由Bruce M. Russett及Richard L. Merritt於1981年所主編之From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Global Community一書中，集結十七篇以Deutch概念為基準之文章，探討由地方至全球層次之統合及社群概念發展，¹¹此外Adler and Barnett之著作也是以Deutch概念為基礎進行更深入之探討。最後，Buzan則是以新安全脈絡為背景並提出安全複合體學理邏輯探討區域安全之建構，而Buzan更在1998年出版之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¹²，與2003年Buzan、Ole Wæver出版的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¹³兩本

¹¹ 請參見：Bruce M. Russett and Richard L. Merritt eds., Frome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Global Communit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W. Deutsch*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¹² Barry Buzan,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 Lynne Rienner,1998)

¹³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著作中，再深入就新安全脈絡以及區域層次之安全複合體概念，進行更完整之詮釋，尤其於後者著作中，Buzan更嘗試將安全複合體學理概念發展為廣泛適用於各區域之理論邏輯，針對欲更深入瞭解之讀者而言為極佳之延伸讀物。

雖然Deutch、Adler and Barnett與Buzan各由不同角度探討安全社群及安全複合體概念，然而他們皆試圖跳脫傳統現實主義之安全研究框架，尋求區域建構之另一種分析架構及途徑，將安全複合體與安全社群學理脈絡進行連結更不失為理想之區域安全建構模式，然而在學理上對於安全複合體如何邁向安全社群之過程細節則尚未有完整之學理概念，為此理論邏輯中較為缺憾之處。¹⁴

表 1.2 本文主要三本著作之概念比較

| 書名 |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 Security Communities | People, States, and Fear |
|----|---|------------------------------------|--------------------------|
| 學者 | Karl Deutsch | Emanuel Adler & Michael N. Barnett | Barry Buzan |
| 年代 | 1957 年 | 1998 年 | 1991 年 |
| | 提出安 | 針對 | 針對新安 |

¹⁴ 相關探討請參見：許文妍，*土耳其與歐盟：安全社群觀點的探討*，中正大學政研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 | | |
|---------------|--|---|--|
| <p>主要內容</p> | <p>全社群研究之濫觴，進行安全社群概念之定義及分類，重要概念包含：社群感及對和平變遷之可靠預期</p> | <p>Deutsch 之安全社群概念進行重探及發展，延續 Deutsch 之重要概念定義，並進行安全社群發展之理論化過程</p> | <p>全意涵進行多層次探討，並提出安全複合體要義詮釋安全社群發展前之區域動態。鋪陳由安全複合體邁向安全社群之區域安全裡想途徑</p> |
| <p>安全研究意涵</p> | <p>安全社群研究之概念化</p> | <p>安全社群概念之理論化</p> | <p>安全研究層次化</p> |
| <p>經驗案例</p> | <p>北大西洋區域</p> | <p>歐洲、南美洲、東南亞、澳洲、美國-墨西哥及美國-加拿大等地區，及第十章談論民主、互賴與國際組織在安全社群建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p> | <p>探討第三世界之區域安全複合體 (p. 210)</p> |

(表二)

J. Cliffor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王宏仁 / 美國丹佛大學博士候選人

“苦境”(Predicament)這個字，對於詹姆士·克里福來說，是關於在現代民族誌中的一種再現(representation)權威的問題。那是一種“……在特定意義系統世界中，與中心疏離的那個廣泛情況，那是一種身在文化之中卻同時思考著文化的狀態，一種個人的或是群體的自我塑造形式(p. 9)。”在這些集結的文章當中(該書集結作者於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間所創作之文章)，克里福指出，民族誌的工作者，往往在將其注意力放在傳統敘述上的同時，忽略了身處在“邊緣位置的人”，其本身作為一種特殊歷史性的存在，以及其對於未來的一種創造性能力。對於克里福而言，以往只是為他人所發聲的人(例如藉由民族誌研究者來發聲)，現在已經開始會為其自身發言了。對於這樣的轉變，民族誌作為一種學科，必須要學習如何去了解這樣新形態發展所產生出來的地理政治問題，以及，去了解到這些他們正在書寫的個人，關於其文化和政治上的各種預設立場。

《文化的苦境》一書，以美國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士(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一首詩，〈給愛爾希〉，作為開場。該詩描述了一個文化錯置、各種傳統離散的世界，其中充滿了各種變化和挫折。而這個世界進一步將威廉士漫無目的地帶到一個失去中心、各種純粹物質已經接近瘋狂的世界之中。威廉士在這個世界中所察覺到的卻是一種重生



書名：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中譯：《文化的苦境：廿世紀民族誌
文學與藝術》

作者：James Clifford

出版者：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Cambridge, Mass.

出版日期：1988 (中文譯版出版日
期約在 2006 年 2 月)

頁數：381 頁

ISBN：0674698428

附注：

(《文化的苦境》一書，其中
中文譯本已由筆者翻譯完成，
將由台灣的桂冠出版社於近
期(2006年2月)印刷發行。
本評論文章則是從該譯本
〈譯者序〉所改寫完成。)

的可能性，即，各種可能形式的出現。雖然說“沒有人在駕駛車子”，但是這部車子卻可以帶領我們到達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未來。對於威廉士來說，這些潛在的可能性都是令人恐懼的，因為它們總是朝著它們自己的方向前進、甚至是形成另一種聚集，並且是只能自我定義的(self-defining)。

在第一章〈關於民族誌的權威〉之中，克里福試圖去追溯出民族誌各種可能的研究途徑：包括試驗性的、文本的、詮釋性的、對話式的和多種聲音的等等權威模式。例如，克里福就認為，與一種深入的文本詮釋方式比較，試驗式的模式就顯得相對主觀以及不成熟。換言之，民族誌對於選擇何種方式來進行研究，是一種策略性的選擇結果。克里福在意的是，如何儘可能地去保有一種在資料素材上的開放性，以避免因為研究者本身的一些侷限，而抹煞了原本其他可能存在的詮釋方式。

在〈民族誌的超現實主義〉這篇文章節中，克里福描寫出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巴黎，其中超現實主義者和民族誌者之間的一些相似性，以及這兩種團體如何成為了普遍流行、重疊的文化態度，而非一種特定的藝術或者學術的形式。這樣的觀察是非常有趣的。在克里福的眼中，為前衛的歐洲人所發掘的“關於黑人的事物”，是和所謂的黑人美國爵士音樂、既是舞者又是歌手的約瑟芬·貝克(Josephine Baker)、一個想像的美洲大陸等等有

著緊密的關係。“在二〇年代巴黎的黑人主體，是一個意識型態的工藝品。古式的非洲(這個非洲是藉由未來的方式來到巴黎—也就是，美洲)是被性慾化、性別化，以及利用特定的方式賦予“神奇魔力”(p.197)。”

克里福進一步討論到關於“收集”的問題。於〈關於收集藝術和文化〉一章中，作者試圖揭露出那個長期將異國文化、非西方物件，賦予一種作為藝術正當性的“文化-藝術系統”。他將一九八四年紐約當代美術館所展示的物品，視為一種現代藝術和部落手工藝品之間的一種聯繫，而這個聯繫卻暴露出一個相當狹隘的歷史面貌、一種具有種族中心主義的歷史。在這裡可以看出，克里福是相當排斥一種具有通則性、普世性的論述結構，而是偏好一種斷裂的、破碎的、甚至是各種不同微小系統充斥在一起所形成的聚集。

毫無疑問的，身為一位民族誌的研究者，克里福的論點是從一種後現代的角度來出發，希望去打破一種單一的、獨白式的論述方式。他試圖尋找出一種並不完全和文獻脫離的“多元民族誌”，進而與後結構主義者、文獻批評者相互聯繫。不論是在於詮釋康拉德或者是薩伊德，克里福不停在提醒我們的是關於文化錯置、浮現和收集的問題，避開一種悲觀的單一文化或者西方霸權論述。

在本書的結尾，作者是以一種歷史記述的方式，將一個在地的美國印地

安人部落，其試圖以對抗的方式來定義自身的過程，完整的描述出來。〈梅斯皮區的認同〉一章，已經對於我們習以為常的“族群”(ethnic)定義提出了挑戰。我們是根據何種過程來定義個別的文化？根據何種權力，可以讓任何一個團體來否定另一個團體自我定義的權力？在這個混血的時代，什麼才是真正組成一個個別團體的基本要素？這些問題，可以同時在不同的層次上被討論，而克里福則是很巧妙的將所有的問題並置在一起觀察。

本書值得肯定之處在於，作者在一些讀者不曾預料之處——例如，含有現代主義立場的詩集、生活日記、博物館的展示品，以及明信片——來檢視那些存在於傳統民族誌思想中的各種歷史發展和傾向。然而，本書的可議之處卻是在於作者的後現代立場：當作者試圖去證明，充滿了西方觀點的各種民族誌論述發展，其實是本質化和去歷史性了各種民族和文化的同時，無可避免地也陷入了這樣的弔詭當中。例如，在〈關於民族誌的權威〉一章中，作者主張儘可能地保留一種資料素材上的開放性，以避免因為作者本身的可能侷限性，而封閉了各種可能的詮釋角度。但是，是否只有民族誌以往依賴的各種權威模式、或是作者提出的“一致平等的多元主義”，才可以成為民族誌研究者的選項？在後現代的世界中，所謂的真相(truth)，充其量是被視為一個過時的產物，或者僅僅是成為另一個宣稱權威的虛構物。然而，為何作者所提出的多元主義或是多重的發聲，會比之前民族誌所呈現的單一論述，更適合

成為接受的選項呢？在強調多元平等，或是多元發聲的同時，難道不也因此本質化了某些對象？難道克里福不是在推銷，某些虛構，是比另一些虛構更為恰當？如果說多元主義或是多重的發聲，並沒有辦法提供最好的真相、或是完整的事實呈現，有什麼理由宣稱這是最適合的選項？簡言之，作者在書中所主張的一個清楚和直接立場，是和其後現代主義角度相衝突的。

無論如何，相信《文化的苦境》一書對於身處在後殖民世界的台灣來說，仍是相當具有啟發性和震撼性的。啟發的部份在於，在一個文化群體的認同建立過程中，雖然是充滿著不確定性、充滿著各種苦境，但卻預示著一種充滿機會的期待；震撼的地方在於，原來長久以來依附於前殖民者來發聲的我們，也有自我發聲、自我定義的可能性？《文化的苦境》對於當代的文化苦境現象，做出了最好的呈現：是否這個我們以往認為是萬靈丹的現代性，可以成功地為後現代、後殖民世界中，那些多元的、邊緣的他者所挑戰和轉化呢？克里福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最終肯定的答案，但是他卻明確的在書中指出，關於這個方向的討論是應該被重視的。同樣地，對於長久以來一直試圖藉由科學化來建立自我認同的政治科學而言，在其不斷地與其他人文學科做出劃分、不斷地建立起與這塊土地的主客二元關係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如同克里福一樣，開始對其學科自身的形塑過程，提出批判性的檢視與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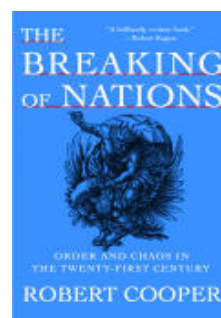
R.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毛維准、徐星 /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冷戰結束已逾十餘載，國際風雲變幻依舊莫測。為探求世界之未來走向，詮釋冷戰後國際縱橫，抑或審視傳統觀測世界發展之視角，若干社會科學大家紛紛推陳出新、著書立說，意欲陳示自己對世界的理解和觀察：Francis Fukuyama 之「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論斷，Samuel Huntington 之「文明的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詮釋，Robert Kagan 之「天堂與實力」(Paradise and Power)辯爭都是如此。異於美利堅話語陣營，大西洋彼岸的 Robert Cooper 也頻頻指點江山。*The Breaking of Nations* 便是源自於他從 1996 年至今的 3 篇文章和劄記。雖然作者一再聲明“文章中的思想僅代表我個人……如果與英國和歐盟的政策有重合，那純屬巧合”(p.vi)，但作為英國和歐盟的資深外交官和智囊，我們可以從該書中探求到歐洲的某些外交痕跡，也可視為是對系列「反恐戰爭」的理論註腳。

總體而言，本書直面當今世界的繁雜局勢和無常變化，在對比歷史上三個階段(14 世紀百年戰爭前後、17 世紀的「三十年戰爭」期間和 20 世紀前半葉)的基礎上，結合 21 世紀面臨的景象，從不同角度對這個「無政府」特徵明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蔓延及恐怖主義橫行的世道及其應對之道予以「間接反思」。(p.ix) 其中內蘊的歐洲視角的「新帝國主義」(neo-imperialism)特質貫穿於反思始終；國家控制



書名：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作者：Robert Cooper
出版者：Atlantic Monthly Press
出版地：London
出版日期：2003 年
頁數：180 頁
ISBN：0-87113-913-8

暴力能力的崩潰、崛起中的穩定且和平的歐洲成為國際關係演變的革命性力量。以行文思路來看，本書在對「世界的現狀」(The condition of the world)予以回顧的基礎上，對“新帝國主義”論調予以系統整理，並提出對「新帝國主義」的各種政治解決方式，即對外交政策的反思和審視，並以此來闡述「和平的條件」(The condition of peace)，隨後 Cooper 介入美歐洲之間的公共爭論，向世人展示了美歐之間的分歧。以筆者之見，關於「新帝國主義」的理論總結和歐美新帝國主義傾向和論調的分歧實為本書的光鮮之處。

首先，為什麼「我們」仍然需要「帝國主義」？

這源於 1989 年之後的世界現狀。在 Cooper 看來，1989 年的意義堪比 1648 年，他堅信 1989 年的劇變不僅意味著冷戰的終結，也標誌著歐洲均勢體系的終結：一個嶄新的體系展現於世人面前；隱於其後的是一種新的國家形態，或至少「國家的行為方式與過去截然不同」。(p. 3) 在這個新的體系中，人們面對的是混沌不堪，衝突、導彈和恐怖分子超越邊界，那種為人們所熟悉的確定性已然不再，邊界對災難和混亂的抵抗能力已然消逝。正是如此，人們的命運休戚相關，「沒有一塊大陸能成為一座孤島」(p. 6)——歐盟不能豁免，美國亦不能豁免——必須尋求一種新手段來應對新形勢。

歷史經驗往往成為我們的嚮導。Cooper 對以霸權和均勢為基礎的舊世界秩序予以審視。他認為，秩序、文化和文明寓於帝國之中，而野蠻、混亂和無序處於帝國之外，依靠霸權來維持和平與秩序的觀念經久不衰；面對歐洲小國體系和多元化的歷史，他認為均勢也是解決之道，但均勢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戰爭總是伺機爆發」。(p. 11) 與此同時，世界不再由單一的政治體系構成，我們面臨著「前現代」世界、「現代」世界和「後現代」世界的分野。「前國家、後帝國的混亂」(pre-state, post-imperial chaos) 是「前現代」世界的寫照。(p. 16) 在那裏，秩序不足，混亂的危險隨之而來；而秩序過度，國家就會阻礙社會的正常運行，驚惶的人們在帝國和混亂之間抉擇；但是，帝國目標過於奢求，所以混亂便是首選。現代世界承認國家主權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內與對外事務的分離，並且禁止對前者的外部干預。在這裏，武力仍然是安全的最後保障，而且至少在理論上可以用武力來改變疆界；這是一個「利益和權力相互權衡的世界」。(p. 22) 但是，世界上很多的地區缺乏真正的平衡，任何團結和強大的國家的出現都會使地區性的均勢體系難堪重負。富有韻味的是，在前現代世界中，國家因為「失敗而變得危險」；而在現代世界，國家因為「成功而成為潛在的危險」。(p. 24) 為了安全，帝國和均勢似乎都應該壽終正寢。

至此，Cooper 一直為其後現代國家概念和新帝國論的粉墨登場而準備；或者，只有後現代國家能夠跳出巢窠。依照作者邏輯，實際上在體系演變過程中，歐洲也未能脫俗，它也在崩潰，但卻是朝一種更高級秩序而不是失序轉變，即歐盟。在這裏，國家之間並不依賴平衡；也不強調主權或者對內與對外事務的分離——國家之間的安全困境的解決之道就在於，結束相互保密的狀態——一種悖論式的宣示：「為了保護自己，你不得不準備毀滅自己」。(p. 27) 邊界對後現代國家越來越無關緊要；與民主社會也更相容：國內的開放社會在一個更開放的國際秩序中得到反映，並且能夠容納龐大、潛在的強國。這種嶄新形式為 Cooper 視野中的世界注入了一劑強心針，世界因此而變得和平昌盛、生機勃勃。

那麼，在 Cooper 所設置的新秩序下，人們如何應對或獲得安全呢？

Cooper 隨即便從所謂的博愛和道義出發將焦點轉向安全建構。他呼籲人們拋棄過去那些傳統的安全規則，從而思考今天和未來安全的必備條件，畢竟面對混亂不堪，人們不可能有絕對勝利——歐洲這片安全島的周遭是充斥危險和混沌的地帶——前現代的混亂和現代世界的危險使其如芒在背。對此，歷史經驗引導的人們必然在動盪和帝國(即無政府狀態和單

一性權力壟斷)之間、帝國和國家主義(即中央集權與均勢)之間、國家主義和一體化(即均勢和完全開放)之間進行抉擇。但是，隨美蘇對抗結束帝國和均勢則早已風采不再。Cooper 揚棄過去，推陳出新，另闢新徑：致力於後現代安全(postmodern security)的「新帝國主義」便水到渠成。(p. 76) 針對「帝國主義」辭彙聲名狼藉的歷史，Cooper 等西方學者便拋棄不齒的經濟驅動的責難，而追求道義方面的高尚，頗有君子不言利之風。他認為，對某些混亂地區而言，西方國家如果從經濟原因出發是不屑對待他們的，但是「帝國主義將有可能出於防禦性的動機——當臨近的混亂狀態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威脅。或者，帝國主義可能是在追求一種理念。」依其所言，這是一種符合人權要求和普世價值觀(cosmopolitan values)的帝國主義，也是旨在帶來秩序和組織的帝國主義。結合 Cooper 在 2002 年 4 月在英國《觀察家報(*Observer*)》上發表的「為什麼我們需要帝國」(*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和「新自由帝國主義」(*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兩篇文章，我們可以發現 Cooper 的新帝國主義實際上有三種形式，一是經濟領域的「自願性帝國主義」(voluntary imperialism)，即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各種動作；另一種則為「鄰邦型帝國主義」(the imperialism of neighbors)，即對臨近地區的種族屠

殺等現象進行干預；第三種為歐盟類型的「合作性帝國主義」(cooperative imperialism)，即合作提供一個參與管理的框架而建構一個共同體。作為「合作帝國」的歐盟和作為「自願性帝國主義」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則是 Cooper 認可的典型，他們都由一整套法律和法規協調運作，而不像傳統帝國那樣依賴於中心權力，從而跳出前言帝國之悖論。

風景看似如畫，但是我們需要稍微品評其個中韻味。Cooper 所宣導的實為一種不折不扣的殖民主義或干涉主義。其政策實際上是對歐洲內部以法律和共同防衛為基礎；但若面對的是歐洲以外的世界，那就須使用武力、先發制人攻擊及欺詐等。誠如俄國 Catherine 女皇所言——「除了延伸以外，我沒有其他辦法可以保衛我的國界」——這恰是對「後現代國家共同體安全策略」的最貼切描述。(p. 78) 雙重性的標準縱橫於國際體系之中可謂相得益彰。而其「合作帝國」構想以及「鄰國帝國主義」則是源於巴爾幹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陰影，它把「人道主義」干預與一種新型帝國主義的概念結合起來，從而使「人道主義」合乎邏輯地成為「帝國」的理論前提——「文明奴隸制」或許更為恰當。

那麼，Cooper 所言之“新帝國”論與當今學術期刊中之洛陽紙貴的“新帝

國”論是何聯繫？它對當今美歐關係是否存在某種痕跡？

關心時事的人大都可以發現，當今國際舞臺上美國和歐洲之間已經不再是亦步亦趨、夫唱婦隨般地協調。兩者在實力、文化傳統和歷史積澱方面的差異也在本書中有著內在或鮮明的敘述；其間緊張形勢，在由 Cooper 對 Kagan 所言的「歐洲缺乏使用武力的能力」的商榷和調侃之中有著明確體現；當然，在前兩部分中，Cooper 的字裏行間都在某種程度上蘊含有恢復昔日歐洲和大英帝國輝煌，重新將歐洲置於世界舞臺中心位置，與美國爭鋒或至少是「共治」的跡象。Cooper 直言不贊成美國的「獨大」角色，「四億五千萬歐洲人如此依賴於兩億五千萬美國人的呵護」難以令人心滿意足，是歐洲重新「審視自我定位」的時間了。(p. 165) 作為歐洲人，Cooper 對於民族國家發端的歐洲又寄予厚望，他深信歐洲也是後現代國家體系的發源地，對歐洲在世界體系中由積極主動態度向消極被動態度轉變的一絲反思追問和痛心疾首。

其實，美國版的新帝國論主張美國要利用當前無可匹敵的實力優勢，使用強權脅迫、干涉甚至侵略其他弱小國家，以美國的價值觀來改造這些國家以便建立一種全新的、美國統治下的、有利於自由和平的世界秩序，使 21 世紀成為再一個“美國的世紀”，其手段主要是單邊主義的、先

發制人的、美國主導的，其目標是實現「單極霸權的穩定」或「美國治下的和平」。¹但是，依靠軍事力量、違反國家法和全球規制的做法恰是Cooper所極力反對的；或者說，Cooper基於歐洲的實際力量而做出的表態；他推崇這種符合人權和全球價值觀，依靠自願原則、旨在帶來秩序和組織的新帝國主義。在此，「對手中僅握鐵錘之人而言，每個問題看起來都像釘子」，(p. 159)歐美之間的不同優勢造就了不同的帝國觀念。歐洲人更加重視合法性和武力在權力獲得方面的雙重功效。但是，對於前現代或失敗國家，兩者卻不謀而合地推崇赤裸裸的強力方式。

具體而言，Cooper 宣導通過經濟領域的自願性帝國主義和鄰邦性帝國主義的加強來達到合作性帝國主義，即擴展歐盟，建立一個「合作帝國」，它可能成為最適合有著實質性改變的後現代國家的地方政治架構，在這個架構中，每個成員都參與政務管理，沒有單一的支配性力量，其管理原則

¹ 美國版的“新帝國論”綜合性研究當屬G. John Ikenberry在2002年《外交》(*Foreign Affairs*)9-10月號上的論文“美國的帝國野心”(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他將其論置於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之後“形成的一種新的大戰略”的地位，這“是對恐怖主義的直接反應，而且它對美國應該如何使用其力量和構建世界秩序形成更宏觀的一種觀點”。如此，“在打擊恐怖威脅和尋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過程中，美國將更少地被其夥伴和全球規制所束縛，而更傾向扮演一個單邊和預防性的角色。美國將運用其無敵的軍事力量來管理全球秩序。”

是法律而非種族的。通過第一部分Cooper對美國明褒暗貶的描述(pp. 44-50)，我們可以推斷「合作帝國」中沒有美國，或者即使有，美國地位也並不顯著，而作為聯合體的歐盟作為民族國家和後現代國家的起源，其歷史進程更為超前，歐盟的開放、相互監督和干預是美國不能企及的，美國經常訴諸的只會是強權，甚至美國還不如日本，原因是美國尚未接受國際社會中相互依存的需要，也不願意接受相互監督和干預。另外，美國的新帝國論意欲確立一種以美國價值觀為普世觀念的國際秩序，而Cooper則並非想違背現有國際法，反而還要加強和完善國家法治，並以之來推行全球治理。他認為，美國因其獨立掌握的超群實力而奉行單邊主義路線；而歐洲對條約、法律規則和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的推崇源於其本身的「微弱實力和睿智思考」。規則得以存在就是為了保護其弱點，並且歐洲人對它們也情有獨鍾。(p. 155)與此同時，大多數歐洲國家更樂意存活於“法律世界(world of law)之中而不是實力世界(world of power)”。(pp. 158-159)需要指出的是，Cooper並不甘於歐洲軍事力量的羸弱和受制於人，他宣導積極提升整體軍事力量，加強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和實力聚集(concentration of power)(p. 157)，因為歐洲軍事力量將會導致更為正規的歐洲外交政策：「實力帶來責任感。」

(p. 170) 其與美國爭鋒的內在涵義不言自明。

到此為止，我們發現 Cooper 實際上在尋求一種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戰略攻勢：獨立的防務政策和外交政策正是這位高級謀士的內在追求；而美國及北約對歐盟再進一步所持有的消極甚至阻礙態度已使 Cooper 等智囊如梗在喉。他高聲調地挑戰所謂「跨大西洋共同體」間所謂的西方認同的存在，直言歐洲的崛起及其成為新的世界中心已為必然，而不管是否符合美國胃口。本書代表的恰是老歐洲人心中所遺留的對昔日光輝歲月的憧憬。

然而，問題恰恰在於美歐之間的關係的調整和歐洲內部的整合進程。儘管同屬於西方團體，但是美國似乎不會坐視其權力的退卻，北約的暗中加強和對歐盟獨立防務外交的干涉可以彰顯；其次，歐盟內部的整合到底能否與美國掰手腕，還需要從長計議，歐盟邊緣地帶融入老歐洲似乎來日方長，在此，現實主義理論似乎更能宣示歐盟前行的路途艱辛。我們不得不說，Kagan 至少有一點是對的，在可測的將來，那裏也僅僅是人們嚮往的天堂而已。

【徵 稿】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全國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徵稿對象：全國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稿件內容：

- (一) 一般書評：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長篇書評：徵求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長篇書評，內容包含 3 至 6 本相關書籍的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三)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 (四) 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之書評的回應，約 1000 至 1500 字。

■截稿日期：每年二、五、八、十一月十日以前。

■稿件筆潤：

- (一) 一般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元整。
-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元整。
-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 (四) 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本刊物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唯保留此項權利。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電子郵件：PoliSciReview@ntu.edu.tw
- (二) 一般郵寄：台北市中正區(100)徐州路 21 號
臺大政治學系[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